

【近代文学】

清末著涪吟社考论

王雪松 耿传友

【摘要】著涪吟社是清末国粹思潮在北方的重要代表,成员数量曾接近三百人。学者关于该社团的研究,因限于材料,结论并不精确。结合新的材料,著涪吟社应肇立于戊申正月,辛亥六月即解散,前后存在接近四年。著涪吟社的结社和运行主要以社刊《国学萃编》为枢纽,这集中体现着清末民初报刊的出现对文人结社产生的重要影响。报刊既是文学社团的创作平台,又是其理论阵地,它使得文人结社活动逐渐突破传统,走向现代。

【关键词】著涪吟社;《国学萃编》;报刊;文人结社

【作者简介】王雪松,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耿传友,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中国文学研究》(长沙),2020.3.92~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安徽博物院藏珍稀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18BZW089)。

清末,庚子之后,东瀛国粹思潮浸染神州。弘扬国学、保存国粹成为一时之宏旨,而清末的社团林立亦为一时蔚然大观。作为清末京师文化圈中的重要一员,著涪吟社以雅士才人之名社集,以“保守国粹”之名创办《国学萃编》,极具活力,也极具影响力,正如学者所云,“它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降清流士人结社联吟的风习;另一方面在其时的国粹思潮中,又颇有保存与振兴国学的贡献,堪称是与国学保存会、南社等沪上社团相峙的北方学社代表”,^①是国粹思潮中极具代表性的北方文学社团。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成员数量曾接近三百人的社团,直至近几年才被学者深入研究,而这些研究也均限于材料条件未能就相关问题进行更加确切、深入的探析。^②

学者对著涪吟社的研究所据材料主要有三:首先是国家图书馆藏《著涪吟社诗词钞》,刊刻于光绪戊申(1908)年,存一卷,实含狭义的《著涪吟社诗词钞》第一卷和《著涪吟社诗钟集》第一卷;其次是国图藏的《著涪吟社同人小传》,为手抄本,抄录于甲寅(1914)春,系为包含金绶熙在内的十二名著涪社员的

小传,与国图一卷本《著涪吟社诗词钞》一起由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收录并影印出版;再者则是苏州大学图书馆藏《著涪吟社诗词钞》,存五卷,即狭义的《著涪吟社诗词钞》第一至五卷,共收录著涪吟社社课五十课。除此之外,笔者亦于南京图书馆见《著涪吟社诗词钞》四卷,内含狭义《著涪吟社诗词钞》及《著涪吟社诗钟集》的四、五、六、七卷,共收录著涪吟社的第三十一至七十课。另,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著涪吟社社刊《国学萃编》的关注远远不够。笔者于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国学萃编》(34册)中见有《广告》一册,系该刊历期广告之合辑,其中包含了一些著涪吟社及其实际结社活动的信息。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于我们厘清著涪吟社的实际存在情况颇有助益。与此同时,从这些随刊的广告中,我们亦可窥得清末民初报刊的兴起对文人结社产生的特殊影响。

一、著涪吟社起止时间考

关于著涪吟社的基本情况,前人所述已备,今将相关信息誊录如下:

1. 著涪吟社由广东番禺人沈宗畸在京师发起并

成立,沈亦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

2.吟社以成立之年命名。所谓“著渚”,取自《尔雅》太岁纪年法中的“著雍”“渚滩”,即对应干支“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

3.吟社以《国学萃编》为社刊,“务在唤起一国之精神”,“网罗散佚,甄阐幽隐”^③。沈宗畸在《国学萃编》的基础上又编“晨风阁丛书”,意在“保守国粹,免落外人”^④。

这其中,著渚吟社的起止时间问题,论者皆因材料之限,结论多系于推论,并无切实证据,仍需进一步探析。

笔者翻检资料,于阳历1908年4月1日《国魂》报一角,见署有“番禺沈宗畸太侔手订”的《著渚吟社简章》。《简章》第一条云,“岁在著渚雍滩,为本社发起之始,故定名曰‘著渚吟社’”。^⑤这与学者们常引的刘村《著渚吟社同人录序》“岁在戊申,番禺沈子于京师肇立吟社,锡名‘著渚’,纪年也”^⑥的说法相合,则著渚吟社肇立于戊申即1908年,应为确论。不过,吟社具体成立时间仍需进一步探索。

著渚吟社的具体成立时间,有学者根据《著渚吟社诗词钞》第一卷第一课《花朝》,将吟社成立时间断为戊申(1908)二月十五,即花朝节^⑦。《著作林》杂志第十七期有《南北社卷选瑜》一卷,选录了著渚吟社多次优秀课卷。值得注意的是,在《花朝》一课之前尚有《题钟馗画像》一课,那么可知《花朝》并非是著渚吟社真正的第一课。又,著渚吟社的社刊《国学萃编》戊申初刊行,每期均“备有告白数页”。第一期的《萃编》有著渚吟社课题征集广告一则,诗题为“宫柳”,限七律四首用渔洋秋柳韵,为“扬州天甌生毕几菴值课”。广告云,此次社课征集“限正月二十前截卷”^⑧。此社课内容《著渚吟社诗词钞》未见著录,而从该社课广告的内容看,发布时间应在正月二十以前,且此时吟社已用“著渚”之名。结合著渚吟社初期提前十日刊发社课广告的规则,著渚吟社的成立应在正月初十左右,不会晚于正月二十^⑨。

关于著渚吟社的结束时间,学者皆因材料限制

未能给出定论。一般情况下,陈止《著渚吟社同人小传序》中所云的“七易岁华,中多更故”之说多受关注。陈止此序自署作于“甲寅春三月二日”,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著渚吟社的存活时间在戊申(1908)到甲寅(1914)这七年里。所谓的“中多更故”,学者提到的是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庚戌(1910年)八月,礼部裁撤,时任礼部执事的沈宗畸远游吉林,学者认为,此时“吟社活动遂告一段落”^⑩;另一个是辛亥(1911年)六月,学者引沈宗畸同时代人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中“辛亥六月,诗社星散,越两月即有武昌之变”的说法,将辛亥六月作为诗社结束的标志,而之后的其他活动是为其余响^⑪。

学者对著渚吟社的讨论所据材料多为《著渚吟社诗词钞》。结合笔者目前所见国家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三家所藏《著渚吟社诗词钞》可知,著渚吟社所结社课应不少于七十课,远多于之前学者所见的五十课。而《国学萃编》共计五十期,每期均有刊登著渚吟社课征诗广告,最后一期所登为第七十八课广告,则著渚吟社的实际结课至少为七十八课。值得注意的是,吟社核心人物沈宗畸远走吉林之后,吟社的社课活动实际仍照旧不误。《国学萃编》第四十五期,在著渚吟社第七十三课征诗广告后有“征撰《吉林纪事诗》题辞”的特别加课广告。《吉林纪事诗》是沈宗畸远游时所作,此次加课“正月三十日截止,二月望揭晓”。又《萃编》第四十七期有“《吉林纪事诗》题辞展期广告”,“展期一月,以四月初十止”。可见,吟社核心虽然远走,但社课活动依旧,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得益于著渚吟社的特殊结社方式(后有详谈,此处不赘),不过至少可以说明至辛亥(1911年)四月,吟社仍然活力满满。

《国学萃编》至第五十期启事“暂停一月”,但一月后并未复刊。第五十期《萃编》上刊有著渚吟社第七十八课的征诗广告,诗题为“金表行”,“限六月二十日截止”,则《萃编》当停刊于辛亥六月。至于“暂停一月”的原因,第五十期有启事云:一是“五十期已齐,各种门类均皆陆续刊完”,预备“由五十一期起,

重订新章,另换稿本”;二是“五十期前阅费未收清,账目亦未理楚”,待总经理吴梦兰回京办理。值得注意的是,该启事末尾还特意提示,“如有续订者,在新章未宣布之先仍照预定全年八扣之例”,可见作为著涪吟社的社刊,其仍有继续办刊的主观愿望,则其最终未能复刊,客观现实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辛亥之变或为其一。前述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中“辛亥六月,诗社星散”的说法应当是基本准确的。除此之外,《今传是楼诗话》还提到了沈宗畸的著涪吟社纪诗,中有“风雅沦亡国运,此中消息几人知”之句,^⑭明确地将吟社的存亡与满清存亡的国运相联系。辛亥革命起于农历八月,作为著涪吟社的社刊以及结社活动的重要阵地,《国学萃编》辛亥六月云停刊一月,而至八月未曾复刊,或可从侧面印证吟社解散的事实。

又,笔者翻检沈宗畸《便佳蓀杂钞》,见有《艺社小引》一则,前有小序,是沈宗畸直接谈到著涪吟社起止渊源的材料,因前人无引,择要摘录如下:

光绪戊申,余结著涪吟社于都门,辛亥武汉乱起,遂解散。越四年乙卯,余复组艺社,每月一课,课凡六门,曰诗、曰词、曰诗钟、曰书、曰画、曰篆刻。社友数十人,均一时之才俊。是年秋,帝制祸起,同人多奔走于筹安会,余亦避地汉皋,社亦消灭矣。《著涪吟社小启》稿佚已久,昨于敝篋检得旧作《艺社小引》,录而存之。^⑮

从沈宗畸的这段直接表述中,我们基本可以将著涪吟社的结束时间系在农历辛亥的八月,即武昌起义之时。而值得注意的是,辛亥六月仍然活力满满的诗社,至八月忽然结束,于是便不难理解沈宗畸诗中著涪吟社关乎国运的说法了。至于沈宗畸这里提到的“艺社”,已有学者做过简单梳理^⑯,并非指的是著涪吟社。南京图书馆藏有《艺社诗词钞》两卷^⑰,第一课“艺社成立诗以志喜”有沈宗畸诗一首,中有“旧人屈指晨星少,社事惊心宿草多”句,注云“著涪吟社止于辛亥秋”,与上文所论相合。需要指出的是,有论者文章提到易顺鼎《甲寅诗录》中的《著涪吟社诗钟

小集,集者九人,以“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分韵,余得“钩”字》一诗,认为著涪吟社至甲寅尚存。^⑱从《艺社诗词钞》看,艺社以易顺鼎为社长,沈宗畸为经理,艺社的参与者多半是著涪旧人,其中不乏颜定信、袁祖光、龚元凯、张瑜、夏仁虎、骆成昌、萧亮飞、金绶熙等著涪吟社早期的骨干。因此,易诗所云的应是指著涪旧人的一次小聚,而艺社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为著涪吟社的余绪,但著涪吟社应确如沈宗畸所云,早在辛亥秋即已解散。

二、著涪吟社的结社与运行

沈宗畸作为著涪吟社的核心和发起人,远游吉林之后,并未影响吟社社课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著涪吟社的结社方式。有学者将晚清民国的文学社团按照组织类型和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分成了家庭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扭结型和官员同僚酬唱型^⑲。著涪吟社属于报刊扭结型和官员同僚酬唱型的结合。

据相关资料的记载,著涪吟社最多时可达二百多人^⑳,戊申(1908)年刊刻的《著涪吟社诗词钞》中,有一份《著涪吟社同人录》,以入社先后为序录有社员119人,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广东15人,安徽15人,浙江14人,湖南11人,顺天9人,江苏8人,山东7人,直隶5人,四川4人,河南、湖北、山西各3人,江西、贵州、奉天、山西各2人,吉林、广西、云南各1人,还有11人为满洲旗人。这些入社较早的成员,很大一部分曾为清廷官员,如沈宗畸曾为礼部主事、易顺鼎曾为按察使、陈寅曾任职外交部、延清曾为翰林院学士,袁祖光曾为吏部主事等,这其中也不乏性耽风雅的京中名士,许多也都是京师文化圈中的活跃分子。因此,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京师文人的消闲交游社团,著涪吟社似乎与其他官员同僚酬唱型社团并无不同,但社团初创“曾不逾月,达百余人”^㉑,这又非普通同僚酬唱型社团所能比。笔者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著涪吟社积极利用报刊媒介自我包装和宣传有很大关系。

戊申(1908)正月,著涪吟社成立,《国学萃编》随

即创刊,原名《国粹一斑》。《国学萃编》甫一创刊,便开始随刊发布著涪吟社社课广告。己酉年初,《国学萃编》第二期出版,登载的是著涪吟社第三十一课的征诗广告。结合《著涪吟社诗词钞》和《国学萃编》看,戊申一年的时间内,吟社共进行了三十次正式的社课,也即是《著涪吟社诗词钞》所载的前三十课。在这期间,著涪吟社十分积极地利用报刊媒介进行社课征集,并进行自我推广和宣传。有“诗界交通机关美丽则吟社社报”之称的《国魂》日报,阳历1908年4月1日创刊于上海,从其创刊号开始,著涪吟社便在该报连续刊登社课征诗广告,而与此同时,沈宗畸手订的《著涪吟社简章》也在该报连续刊载,广而告之。直到1908年4月11日,《国魂》报社才启事“著涪吟社简章因限于篇幅,故不刊布,欲知详细,请观前报”^③,并逐渐撤下《著涪吟社简章》,但社课征诗的广告一直持续。除此之外,沈宗畸还多次将结社的社卷寄给《著作林》的主编陈栩。陈栩以《南北社卷选瑜》为题,将这些社卷选录在《著作林》第十七到二十二期,并附上了精彩的点评^④。陈栩是当时知名的报人,又以诗文名世,他的筛选和点评对著涪吟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积极利用报刊进行宣传或许并非是著涪吟社能够具备“曾不逾月,达百余人”的影响力的主要原因^⑤。但著涪吟社依托报刊进行社课征集的结社方式却值得注意。1908年4月的《国魂》报上所见的沈宗畸手订《著涪吟社简章》(后文简称“吟社简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涪吟社初期的结社情况,再结合戊申(1908)年《国学萃编》第一期所载的《值课章程》,以及己酉(1909)年《国学萃编》第十期上的《著涪吟社重订章程》(后文简称“重订章程”),我们可以很系统地梳理出著涪吟社的这种特殊结社方式。

1. 社课频率

关于著涪吟社的结社频率,1908年4月的《吟社简章》中就有明确说明:“每月三课,每课二题。一诗题或词题,一诗钟题。逢五送题,下期收卷。”朱则杰

先生将《著涪吟社诗词钞》的第一课“花朝”考在了戊申(1908)年二月十二^⑥,那么,按照简章所云每月三课的频次,前三十课应确系在戊申年完成的。另,从己酉年六月正式实行《重订章程》的第四十课开始,社课频次由之前的每月三次,变成了“每月两次”“半月揭晓一次”。《国学萃编》第二十五期有著涪吟社第五十三课的广告,诗题为“冬晴/冬暖,七律各一首”,“限十二月二十日截止”,则从第三十课到底五十三课的24次社课应系在己酉年完成。

从《国学萃编》的社课广告看,至辛亥六月,著涪吟社共进行社课78课。因此前未有人著录,今根据《国学萃编》的社课广告情况,将其中所载的第四十至七十八课系月整理,以供参考。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己酉年后,确实如前所述,著涪吟社的社课频次已经开始逐渐从一月三次变化为一月两次。

2. 值课制度

著涪吟社每次社课必设值课一人,其目的是为了 避免社课成为文人娱乐的游戏。《值课章程》云,“本社拟有值课一门,原为讨论文艺,启沃志识,发扬潜德,为一代之诗史,以传久远,故不得不立范围,免蹈近日社课之腐败”,又“凡我同社,均属文人雅士,决不自毁名誉,失信于天下,蹈有题无榜,有榜无彩之大病,故本社暂不取保押费”。所谓“近日社课之腐败”,即指“有题无榜,有榜无彩之大病”,此应为当时文社社课之通病。一般情况下,值课者须是社内耆宿或者延请社外名流。按照《吟社简章》,著涪吟社的社课系由“同人轮流值课”。《国学萃编》社课广告中均标明值课人,其名号可考者有蔡中燮、何震彝、余葆桢、裴祖椿、沈仁垓、金绶熙、赵调梅、陈寅、余窰、李盛基、汪应焜、卢友燁、吴清庠、俞丽宸、李国瑜、朱点衣、程霏、吴仲、钱文彬、阿麟、定信、袁祖光、张瑜、万秉鉴、嵩麟、易顺鼎等,这些均是著涪吟社的骨干成员,其中不乏当时的诗坛翘楚,如易顺鼎、金绶熙、袁祖光、陈寅等。另,按照《值课章程》,入股捐助社资者亦可值课,“凡附股十元者,可值诗课一次,

年份	月份	社课	诗题/词题	诗钟题
己酉年 (1909)	六月	40	题桐城吴芝瑛女士书楞严经	走马灯/迎春柳(分咏体)
		41	题太康张氏世忠录	中/伏(鹤膝格)
	七月	42	秋阴	万/萤火(分咏体)
		43	采菱词	秋燕/赛金花(分咏体)
	八月	44	咏史	月饼/谭鑫培(分咏体)
	九月	45	登西山放歌	长城/胭脂(分咏体)
		46	咏趣园六景	蒙师/坤履(分咏体)
	十月	47	追悼戴岑永三君子诗	雷/张子房(分咏体)
		48	孝钦显皇后奉安恭祀	孟/冬(兔胫格)
	十一月	49	过杨柳山先生故宅	秋鹰/刘棉花(分咏体)
		50	听京师瞽者王玉峰三弦子作歌	瞽者/三弦子(分咏体)
		51	诗题:咏六朝人物 词题:秋雪	雨花/仙史(嵌字格)
十二月	52	挽南皮张文襄公	广/雅/堂(鼎峙格)	
	53	冬晴/冬暖	冬/岭/秀/孤/松(五杂俎格)	
庚戌年 (1910)	正月	54	诗题:颐和园词 词题:梅影	冰/李义山(分咏体)
	二月	55	陈圆圆画像歌	天/魂(分咏体)
		56	送江杏村侍御回闽	骆驼/陶渊明(分咏体)
	三月	57	感怀	卞玉京/太白酒楼(分咏体)
		58	春昼/春夜	野/花(三四辘轳体)
	四月	59	征和四十述怀诗	幕/巢(五四卷帘格)
	五月	60	睡狮/大人	可/园(魁斗格)
	六月	61	香篆/帘波	琵琶/枇杷(分咏体)
	七月	62	六朝宫词	鲋鱼(合咏体限典字)
		63	食肉糜/哀鸿集/衣锦归/沐猴冠	流民图/四轮马车(分咏体)
	八月	64	秋灯/秋虫	发/赵武灵王(分咏体)
		65	仿曹唐小游仙诗	杜牧之/夹竹桃(分咏体)
		66	古谣八首	绿菊/箫(分咏体)
	九月	67	琉球/安南/高丽	安重根/台湾(分咏体)
十月	68	秋海棠	九头鸟/苏武牧羊(分咏体)	
	69	纸账/芦帘	红楼梦(合咏体限嵌湖字)	
十一月	70	陆军篇/海军篇	酸菜/上海(分咏体)	
十二月	71	咏历代女将	射虎石/燕然山铭(分咏体)	
辛亥年 (1911)	正月	72	诗题:阑干 词题:题余淡心板桥杂记	帐钩/赵飞燕(分咏体)
	二月	73	火车/马车/电车/洋车	猪/裹(嵌字凤顶格)
	三月	74	狐听冰/犬吠雪/矛头米/鬃尾桐	新内阁/钟声(分咏体)
	四月	75	收鼠	病/黠鼠赋(分咏体)
		76	望煤山吊明烈帝	司马迁/敝屣(分咏体)
六月	77	乳燕	万柳堂(鸿爪格)	
		78	金表行	我/浮云(分咏体)

附股五元者,可值诗钟或联语一次”。

据《吟社章程》,著涪吟社的值课人,需要办理的事项主要有三:一是拟题,二是阅卷,三是备奖。值课者需在送卷前三日拟定社课题目,阅卷则“或延请名宿,或自行评定,均听值课者之便”。备奖,则“每课两榜,诗课彩约三元,诗钟彩约二元”,“每课取列不论高低,均备奖酬教”,而彩品则“不外纸币文玩之类”。彩品备齐之后,起初是由值课者寄送,重订章程之后则改为由著涪吟社代为寄送。除此之外,为便于报刊社课征诗广告的发布,“凡欲值课者,先将课题抄录清楚,书姓氏、居址、官衔、截止日期,并前五名之彩交下方能照登”(《值课章程》)。收卷日期由值课人制定,考虑到京外社员众多,《值课章程》中特意指出“外埠应课往返程途须耽时日,截止暗展十天”。应课必须用著涪吟社统一的课卷,“无论京外,不用本社课卷者,概不送评”(《重订章程》)。

3. 奖评情况

按照《吟社简章》的说法,著涪吟社每次社课必有排名。“每课评定后,请交由本社专足传观。开课伊始,课卷无多,拟即用原卷装订成册。传阅后,再将原卷分别发还。自第二课起,即将揭晓卷付之石印。各派一份,以省传观之烦”。从这个程序看,刻印本《著涪吟社诗词钞》所录应只是最终的“揭晓卷”,即优中选优后公开的课卷。这在《著作林》中陈栩选辑的《南北社卷选瑜》中可以体现。《南北社卷选瑜》卷一有“都中沈孝畴寄来著涪吟社‘题钟馗画像’课卷一束”的记录^⑩。从“一束”的量词看,应不是刻印成册的课卷,而是原卷。再,《选瑜》卷二又云,“‘花朝’原案刊至十二名止,兹见余卷仅多佳句……‘春日田园杂兴’原案刊至十六名,而落卷中佳句亦多”^⑪。“花朝”和“春日田园杂兴”是著涪吟社的第一课和第二课,《著涪吟社诗词钞》中确实分别仅录十二首和十六首。于是,这就不难解释有学者所疑问的,为何诗人诗集中有署“著涪吟社

社题”等字样却并不见于《著涪吟社诗词钞》了^⑫。按照《重订章程》,每次社课著涪吟社需向应课者寄送的东西有,“诗卷、诗钟卷各一份,诗词钞等四页,揭晓单一张,应得之彩”。这里的揭晓单则应是上次社课的排名,而所谓的四页诗词钞应即优卷的刻印,我们所见的《著涪吟社诗词钞》七卷应该系以此汇集而成^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著涪吟社课卷原卷是标有名次和评语的。《选瑜》共有五卷,所提到的著涪吟社诸课中罗列的各课名次,与《著涪吟社诗词钞》所录诗歌的顺序完全吻合,那么《诗词钞》中所录诗歌顺序是为名次无疑。至于评语,则应在原卷中散落,《选瑜》中偶尔也有提及。如第八课“咏明女将秦良玉”,卷中所取第二名为成昌,原批“字字精炼,以少数胜人多数”^⑭,第十二课“采莲曲”,评金绶熙四首的原批有小注云“原拟选第一,因中稍有语病,抑之”^⑮。其余评语目前则不见。

著涪吟社具有严格的结社时间和程序,并力行实践,这是其能够很快崛起并引发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但从种种材料看,著涪吟社实际也在逐渐走下坡路。这其中,外部的社会原因当然值得参考,但内部原因亦值得探析。

首先,应该是经费问题。翻阅历期的《国学萃编》,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不算频繁的社课广告之中,夹杂着的是越来越频繁的催收社费的广告。据《吟社简章》,社员社费“每月每人纳铜元二十枚,作为卷资、邮费并开支、石印、工价等项之用”。《重订章程》后,社课频次减少,“每月二课,共收铜子十枚”,还特别指出“欠资至两课即停送课卷”。值得注意的是,著涪吟社多次借助《国学萃编》告白“排工纸料所费不贲,寒士生涯,不堪亏损”,并广而告之向社员催缴社费。另外,每次社课的彩品,起初收到后只需“付给收条,以资凭信”(《吟社简章》),而后来,可能因为外省社员的不断增多,邮费负担相对较重,《重订章程》时规定,“外省每月每人纳邮费十分”,但“应

得之彩品即由本社寄上，毋庸再纳邮费”。不过，在过了不到一个月的第二十二期《国学萃编》中又登广告白云，“凡有本京外省诸同社，应得彩品均由本社垫邮费代寄，二分以内者不计，二分以外者，均当将邮费还此。数课有未还者，下次恕不再寄”。^⑧但维持了十数期后，又出现了问题：“诸友收到彩件照章应将邮费如数寄还。查去年至今，敝社垫付邮费甚多。诸君有未寄还者，祈从速赐寄，并将本年社费一并寄下。”不仅彩品邮费不能追回，连社费都无法收齐，令人唏嘘。最令人辛酸的是登在第三十四期《国学萃编》上的一则启事：“本社各课揭晓之彩品，本京已饬价专送，外省者亦早交邮。惟本年之社费所入寥寥，加以寄彩所垫邮费，仍未蒙赐还。虽此区区，亦未易周转，务社同文，维持风雅，该欠之社、邮费早为赐下。俾得社事绵长，不胜感荷之至。”一再地催促缴纳邮费和社费，而且越来越急促，而与此同时，作为社刊的《国学萃编》大量发行，订阅费也迟迟无法收齐^⑨。著涪吟社，作为一个不与铜臭为伍的文人雅士群体，如此频繁地呼吁缴纳费用，或许已经透漏出了吟社资金上的入不敷出。

其次，著涪吟社的缓慢衰陷与其结社方式有密切关系。报刊纽结型诗社，“大部分社员是通过阅读报刊得知某社团征题投稿而成为其中之一员，他们相互之间不一定认识，且生活在不同空间环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与切磋”^⑩。按照著涪吟社的《值课章程》，“凡订阅《国学萃编》者皆可应课，无论京外，均不必再纳社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学萃编》的订阅者即是潜在的著涪吟社社员。《国学萃编》分别在上海、南京、嘉兴、苏州、芜湖、安庆、清江、镇江、济南、天津、香港、河南、湖北、广东，甚至日本的大清使署和中央学堂设有代派处。代派处以南方城市为多，可从侧面见出著涪吟社的社员以南方人居多。陈栩《南北社卷选瑜》第二卷中提到了著涪吟社的第六课，云“揭晓分南北两榜，北榜洵推铸秋籒朱璞逸鹤一卷为冠……南榜仆忝居第一”^⑪。观《著涪吟社

诗词钞》，此课只录北榜，无有南榜，这无疑又一次说明《诗词钞》所示并非全璧，而同时设立南北两榜又与吟社多南方成员的事实相印证。南方人士较多，某种意义上是著涪吟社从一个区域性的北方社团逐渐具备全国影响的重要体现。但京外人士的增多，也为吟社结社带来了不便。《国学萃编》的社课广告中，时常见到因“省外社友得题较迟，往返之间易逾期限”而不得不延期揭晓的情况。起初只是外埠展期十日，之后改为半月，己酉下半年则直接展期一月，甚至不得不为外埠同人提前预告下期课题。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课的进度，著涪吟社课频次的下降与此不无关系。

不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著涪吟社与其他报刊纽结型的社团不一样的，它起初是一个同僚酬唱型社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有前述种种不堪，但社课活动依然在继续着，从《国学萃编》最后一期的启事来看，依然有继续下去的行为倾向，真正使得吟社戛然而止的应是沈宗畸诗中所讲的“国运”。

三、著涪吟社的意义与影响

经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社刊的《国学萃编》实际上正是著涪吟社特殊结社模式的核心载体，而《国学萃编》的广告板块也在一定程度上编织起了属于著涪吟社的生态网络。综观这些广告，除了正常的社课广告外，尚有捐助社资广告、特殊聚会广告、社会事件纪念题咏广告、征收名家手稿遗稿广告，以及以著涪吟社名义刊刻书籍并售卖的广告等等。这些广告实际上正是著涪吟社对《国学萃编》“网罗散佚，甄阐幽隐”宗旨的践行，“务在唤起一国之精神，振奇侠之气”^⑫。围绕着《国学萃编》，著涪吟社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了一个集搜集、整理、刊刻、品评、营销为一体的国粹出版机构。文人结社，自古有之，至明清而盛。清末民国，社团林立，门旗各异，但这也并非是对前代的复刻，一定意义上，现代报刊传媒的出现改变了原本的结社方式，冲击了旧有的文

学传统,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铺展了道路。具体来说,报刊对清末民初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以报刊为核心的结社,冲击了以地缘、亲缘、政缘为纽带的结社方式。据学者统计,晚清民国的文人社团有二百多个^⑤,更多的社团依然是靠着地缘、亲缘、学缘的方式维持和纽结,如著涪吟社这般依靠报刊杂志来纽结的社团仍在少数。但是中国近代文学大幕的真正拉开却是诸如南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及其主办期刊的争奇斗艳。不管何种研究,我们都不能不正视报刊等现代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云,“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贵其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⑥。报纸期刊的存在,使得文学传播的范围不再囿于文人的狭小圈子,而将文学与更广泛的大众联系起来。从早期文学期刊所载诗词看,《瀛寰琐记》尚存在鲜明的地域色彩,以文人内部唱和为主,但之后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则打破了这种唱和酬赠的创作传统,作者开始遍及全国^⑦。具体到文人结社,著涪吟社能够依靠《国学萃编》进行纽结的核心原因是《萃编》保存国粹、传承旧学的思想主张。沈宗畸等人因为国学、国粹而结社,又因国运、国难而解散社团,多数吟社旧人进入民国后都做了遗老。他们的结社,更多依赖的是文学主张和思想观念,这样的社团纽结方式也是后期南社、文学研究会等现代意义文学社团的基本纽结形态。这种突破地缘、亲缘、政缘圈子而进行的文学场域构建方式,与其说是文学的传播范围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而不断扩大,不如说它实现的是一种文学创作群体在纽结方式上的让渡,即由地缘、亲缘、政缘为纽结逐渐让渡为以思想、主张、政见、文化趣味为纽结,而这些纽结因素均是现代文化观念的产物^⑧。

其次,以报刊为纽结的结社,促成了结社文人的身份转型。就清末民初的文学社团来讲,文学期刊的出现实际上开辟的是一个跨时空的集体创作场

域。在这个场域中,文人的身份变得多元,既是创作者,又是定期刊物的编辑,又是书籍的出版者。创作者仅需要考虑自己的创作,编辑则需要在组稿和编稿中去践行刊物的宗旨和主张,而出版者则有兼具商人的特点,进行推广和营销。《国学萃编》的主编沈宗畸、经理吴梦兰便是这样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国学萃编》第一期就明确指出了征稿方向和出版规划。除刊发时贤来稿外,“每期留一二卷专刊名家遗稿”,并征求闺阁诗词、传奇小说,刊物简章中还特意提出“他日全书告成,拟名曰晨风阁丛书,每集十种,分甲乙丙丁等共十集”。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学萃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丛书出版计划,综观五十期的《国学萃编》,共刊出《绿天香雪簃诗话》等四十二种^⑨,尚有《小三吾亭词话》《感旧集小传》《掣鲸室诗集》《海底愁续》《诗人征略》五种未能刊刻完全。除此之外,笔者翻检《国学萃编》的广告栏,以著涪吟社名义刊刻或代售的作品有《诗钟鸣盛集》《地方自治制度丛编》《晨风阁分体诗钞》《拜驾楼小品四种》《疑雨集》《宣南梦忆》《落花诗唱和集》《两淮戡乱记》《冒氏小品四种》《妇人集注并补》《香痕奁影集》《思贤尚友笈》《说剑堂集》《飞素阁集》《晨风阁丛书第一集》《赖古堂尺牍》《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诗钟鸿雪集》《香草笈》《京都百二竹枝词》《二铭室印谱》《定山堂小品》《白竹君遗书》《渔洋集外诗》《吉林纪事诗》《塞上雪痕集》等多种。从这些整理诗稿文集并进行刊刻出版的工作来看,以沈宗畸为代表的著涪文人,已不再只是以消闲娱乐的方式介入结社,从文士到编辑再到出版家和书商,他们自觉背负起的是保存、整理国粹的文化使命,并借此来影响社会文化。这种带有思想交流、文化传递功能的社团活动,正是期刊杂志带来的。

再次,期刊的存在为结社建立了章程和纲领,是文学社团走向现代的基础。正如荷兰学者贺麦晓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社团和期刊时所坚持认为的,“如果社团不能以集体名义出版发行他们的作品或杂志,

就难以证明这个文学团体的存在”^⑥。如果我们从清末民国围绕着期刊杂志进行的包括结社在内的文学实践活动来看,贺麦晓的说法或不失为一个公允的论断——因为期刊杂志所树立并践行的是一个社团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正是一个社团所以成立的标准——清末民国,期刊就是文人结社现代转型的重要依据。需要指出的一点,也是学术界经常混为一谈的事情,文学社团不等同于文学流派。“虽然两个概念都指共享特定文学‘意识形态’的‘个人’组成的团体,但是不像文学流派,文学团体同时也作为‘体制’存在”^⑦。所谓社团作为体制,便是说现代意义的文学社团所具备的具有纲领性质的章程,这个章程用来表述的是这个社团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团的自我形象。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章程,社团的成员在创作时往往“将自己的某些观念或行为有选择地归属于某个社团,而不是仅仅作为个体的自己”。^⑧于是,当我们回看著涪吟社的《吟社简章》《值课章程》《重订章程》以及国学萃编的《本社简章》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具有保守性质的诗社因这份期刊而显露出的现代气质。《国学萃编》第一期刊发的同时,著涪吟社便在刊物上加课,征求“国学萃编发刊辞”和“国学萃编题辞”。这些题为“国学萃编序”的文章或诗词后来陆续刊载在《国学萃编》第一至九期,阵势浩大。这些文章或诗词表达的内容十分相似,甚至雷同,在其中反复诉说的是当下的时态,所谓“括帖流毒,遂荒六经”,“欧化灌输,土苴群籍”,“俗学波靡,古谊殆绝”,而当此势态,“抱守之责,正在吾党”^⑨。面对“欧化滋炽,夏声骤瘖”的情况,《国学萃编》“扬葩振秀,阅妍甄奇,鼓吹一时,漱涤百派”^⑩,成就了“振一国之精神”的寄托。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著涪吟社摆脱了传统文学社团以消闲娱乐为大旨的结社方式,这些旗帜鲜明的序言于著涪吟社来讲像是宣言,又像是条例,与那些章程一起明白地诉说着著涪吟社保存国粹的坚实立场。同样是报刊纽结型的诗社,上

海的涪吟社创办了文艺类小报《国魂》^⑪,因是小报,不发宣言,不设发刊词,多属消闲之用,所以总体来讲与传统文人的消闲娱乐并无多大差别。而《国学萃编》的这份担当则“不但挈提乎存古,抑且赞助乎维新”^⑫,具有通向现代的气质。期刊创刊及其持续刊行,一定意义上是对文学社团纲领和主张的持续践行,它是社团创作的平台,又是其理论阵地,它使得文人的结社活动突破了传统,在身份特征上实现转型,逐渐走向现代。

清末民国是一个被变革定义的时代,而当国粹思潮作为一个保守运动出现之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的是,通向五四的文学并非是清末民国文学的全部。著涪吟社作为国粹思潮中的一个份子,有些特殊:它虽然以保守的姿态出现,但却始终以现代期刊去勾连和搭建自己的结社平台;其社刊《国学萃编》,与《国粹学报》等建言立说、发现传统、重释历史的态度也不同,它更倾向于整理和保存国故,因此刊刻出版成了著涪吟社结社之外最重要的活动。著涪吟社从戊申正月肇立,至辛亥六月随国运覆散,并非是其无法与时俱进,而是其宗旨使然、理念使然——国运衰,起而保存国粹,国势去,退以遗老自居——这是著涪吟社以其保守的姿态为时代写下的最好注脚。

注释:

①孙浩宇:《清末北京著涪吟社岁时活动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第98页。

②关于著涪吟社研究论文,目今所见的专门论文有朱则杰的《著涪吟社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和孙浩宇的《清末著涪吟社及其旅京东北籍诗人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清末北京著涪吟社岁时活动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清末著涪吟社旗人诗词考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统共4篇,其他诸如范志鹏《易顺鼎诗词结社考》(《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李思雨《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以及庄德友《晚清民国诗钟研究》

(苏州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的附录“晚清民国文人结诗钟社考”等,在论述时亦有提及著渚吟社,并进行了相关描述。其余,则散落在学者的著述及相关工具书中。这些论述均因材料所限,未能将著渚吟社相关信息明晰,有些论断还停留在推测层面上,未能落实,甚至存在错讹。

③相关信息见《国学萃编》第1期附页的《本社简章》。

④(清)潘飞声:《晨风阁丛书序》,《晨风阁丛书》,清宣统元年刻本。

⑤(清)沈宗畸:《著渚吟社简章》,《国魂》,1904年4月1日。

⑥(清)刘杼:《著渚吟社同人录序》,《著渚吟社诗词钞(第一卷)》,清光绪戊申刻本。

⑦⑪⑫朱则杰:《著渚吟社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第158页,第161页,第158页。

⑧见《国学萃编》第1期封面内页广告。

⑨又,《国学萃编》第五期载有《著渚吟社主人启事》一则,刊登者为沈宗畸。这则启事的主要目的是告知著渚吟社同人洗印一周年纪念合影的相关事宜:“前因著渚吟社一周年之纪念定于初七日,奉约诸社友光临敝斋,同往纫兰阁拍照。后接敝署知会,是日京察过堂,不能不到,恐回舍太晚。且纫兰阁业已倒闭,必须另觅别处拍照,而同社新旧合计不下百余人,势难一一知会。因是之故,颇费踌躇。幸是日散衙尚早,回舍见座客几及四十人,且皆入社最久者……在厂甸内丰泰号拍十二寸大片……”宣统元年(1909)正是京察之年。据《清实录·宣统政纪》,京察是在闰二月,则此次周年纪念日便是闰二月初七。又,《国学萃编》第廿八期有“无锡张孟劬大令寄来著渚社同人团拜费八两”的告白,其小注云“正月廿五,著渚社两周年纪念拍照即以此款开支”。这两则材料可为著渚吟社成立于正月二十前之佐证。

⑩孙浩宇:《清末著渚吟社及其旅京东北籍诗人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42页。

⑫(清)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⑬(清)沈宗畸撰:《便佳蓀杂录(三十九)》,《青鹤》1936年总第13期。

⑭⑰⑱⑳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29页,第39页,第46页,第46页。

⑮南京图书馆所藏《艺社诗词钞》共存艺社课七次,分

两卷,第一卷为甲寅闰月手抄,共三课,第二卷为甲寅仲冬刊刻,共四课,每首诗后均有评语。

⑯范志鹏:《易顺鼎诗词结社考》,《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45页。

⑰据笔者目前统计,著渚吟社成员至少有283人,其中《著渚吟社同人录》录有著渚吟社同人119人,《著渚吟社诗词钞》中参与社课者可析出至少146人,《国学萃编》中参与值课等事务者可析出11人,《著渚吟社同人小传》中还可析出7人。

⑱(清)刘杼:《著渚吟社同人录序》,《著渚吟社诗词钞(第一卷)》,清光绪戊申刻本。

⑲见《国魂》日报1908年4月11日广告栏。

⑳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林》第十七到二十期的刊布的所有社卷,均是著渚吟社社课,可见其宣传力度之大。

㉑这一方面要考虑报刊的发行量和销售量,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报刊的受众问题,十分复杂,而据一些材料,晚清的报刊,发行量和销售量之间并不能完全形成正比,因此,不能以著渚吟社积极利用报刊推广作为其壮大发展的核心原因。

㉒(清)天虚我生撰:《南北社卷选瑜卷之一》,《著作林》1908年总第17期。

㉓⑳㉔(清)天虚我生撰:《南北社卷选瑜卷之二》,《著作林》1908年总第18期。

㉕朱则杰先生《著渚吟社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一文所用材料为国家图书馆藏的《著渚吟社诗词钞》(仅有第一卷),文章述及丘逢甲署有“著渚吟社题”字样的《新乐府四章》《虫豸诗八首》《拟杜诸将五首》《菊花诗四律》四篇未见《诗词钞》著录(实际上,除《菊花诗四律》之外其他三篇均见于《著渚吟社诗词钞》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朱先生写作此文时未曾见到)时产生疑惑,认为《诗词钞》有总集和选集之分。

㉖从目前笔者掌握的信息看,每卷《著渚吟社诗词钞》并非一次刊刻,而是多次刊刻后的汇集。整个《著渚吟社诗词钞》是由三个不同印刷机构印刷的,第1-27课由广益印字局承印,第28、34、35课由集成图书公司承印,第29-33课、第36-40课由丰记印书局承印,第41-60课由丰源印书局承印,第61-70课由益森印字局承印。《国学萃编》第四期中有“紧要告白”一则解释了个中原因:“本编原系由广益印字局承印,今该局因股东意见不合,业于月底闭歇。现在本社或托他人代印,或再集股本二千元自置印携铅字,尚未定义。如各股东有以添股为然者,望于日内订期与沈太侔面商办法可也。第五

期《萃编》尚须亟觅印局代印,此期出书稍迟,务祈定阅各位原谅,勿加诘责。幸甚!幸甚!”结合《著渚吟社重订章程》中的记载,《著渚吟社诗词钞》的情况应与《国学萃编》相同。

⑲(清)天虚我生:《南北社卷选瑜卷之三》,《著作林》1908年总第19期。

⑳见《国学萃编》第22期广告。

㉑《国学萃编》实际订销量十分可观,第十五期有《紧要告白》一则,云“以前每期仅印一千册,今存无几,其中有已售罄必须再版者……”,到第二十三期又有补印第三期一千册的广告,每期一千册均几乎售罄,且还要加印,可见定阅量之大。《萃编》开始实行的先阅后订的策略,但后来订阅费迟迟未见收齐,广告栏随处可见催缴订阅费,至第五十期后,不得不暂停发行,清理账目。

㉒见《国学萃编》第1期附页的《本社简章》。

㉓(清)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10页。

㉔胡全章:《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23页。

㉕焦宝:《晚清杂志与诗词关系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第254页。

㉖这四十二种著作分别是:《绿天香雪簪诗话》《拾遗室师

友诗录》《怀珉精舍金石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鍊庵骈体文钞》《萝庵游赏小志》《今词综》《韵麈词》《石间集》《鸥梦词》《湖船录》《湖海同声集》《骈花阁文选》《宝获斋文钞》《幽梦影正续集》《建康同游记》《芙蓉庄红豆录》《诸华香室诗钞》《湖海楼文集拾遗》《朴学斋文钞》《梅韵楼诗话》《望夫石传奇》《饮琼浆馆词》《辽东行部志》《铜仙残泪记》《诗群》《梦玉词》《说林》《迷话》《今齐谐》《异伶传》《婉嫔封》《孟兰梦》《琼花梦》《明诗记事钞》《江乡渔话》《谋野集删》《晦僧文略》《罗浮游记》《五湖游稿》《怡情小品》《毛郑诗斟义》。

㉗阎伟:《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之路——评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1911-1937)〉》,《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4期,第213页。

㉘⑳(荷)贺麦晓著,陈太胜译:《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第17页。

㉙(清)夏仁虎:《国学萃编缘起序》,《国学萃编》1908年总第1期。

㉚⑳(清)郑钟琦:《国学萃编序》,《国学萃编》1908年总第6期。

㉛关于丽则吟社与《国魂》报的相关信息可参看黄帆:《丽则吟社及其韵文创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Checking and Discriminating of Zhutun Poetry Club,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ress and Society of Scholars

Wang Xuesong Geng Chuanyou

Abstract: Zhutun Poetry Club, whose members were up to nearly 300,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end of cultural quintessence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it's a pity that studies of this club could not give a exact conclus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evidence. By the study of some new materials, we can conclude that Zhutun Poetry Club was established in January 1908, and dissolved in June 1911. The operation of Zhutun Poetry Club basically depends on its press Guo Xue Cui Bian, which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on the society of scholars. As a platform of creation and ideology, press made the society of scholar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 going to the modern.

Key words: Zhutun Poetry Club; Guo Xue Cui Bian; the press; the society of scholars